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 内涵意蕴与实践进路

阮一帆, 王智博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因地制宜是其发展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 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既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变革的必然结果, 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创新, 更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范式的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充分运用及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时代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核心在于体制机制建设。应通过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培育现代化产业及发展数字经济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激发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活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因地制宜;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5)06-0001-09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实践和创新, 为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能。202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2], 是对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 必须立足于因地制宜, 在充分考虑生产活动的区位条件和历史传统基础上进行生产力布局优化, 进而在地区差异基础上实现生产的协调,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这一过程要求构建和完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确保改革措施能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优化现代产业架构、塑造科技创新竞争优势, 从而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与生机活力。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

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 其核心特征在于突破性技术创新。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在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既是挑战, 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优势。“因地制宜”强调立足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等客观差异, 因势利导、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入分析地区发展差异的历史成因、差异化发展的独特优势以及各地实践探索的典型经验, 系统阐释这三重

作者简介: 阮一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王智博(通讯作者),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cug_w529@163.com(湖北 武汉 430072)

逻辑的内在关联和辩证统一关系，对于科学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逻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变革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结构，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提升都源于对新技术、新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对生产方式的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催生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变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 (P144)}。首轮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核心驱动力，催生了机械化纺织体系的历史性转型。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随着高效内燃机的标志性突破而兴起，此次革命核心动力转向了电力，以此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飞跃的崭新引擎。步入20世纪中叶，信息技术的迅猛崛起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共同孕育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诞生。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影响力逐渐超越电力，在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重塑了社会结构。这一过程不仅预示着一个全新工业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加速推进^[4]。

我国地区发展差异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历史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深刻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自然地理条件的客观制约构成了差异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海运条件，在对外开放中占据先发优势；长江流域依托黄金水道形成制造业集群；西部地区虽交通相对不便，但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清洁能源资源。历史发展基础的差异性积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格局。近代以来各地区工业化起步的时间和重点不同，上海、天津等地区较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东北地区形成重工业基础，中西部地区在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积累独特优势。政策导向的时空差异效应在地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从经济特区建设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强化了各地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特色。市场化程度的不平衡演进则直接影响着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活力。这种历史形成的差异化格局，客观上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因地制宜，立足各地实际条件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形成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的必然选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推进，与智能相关的技术形成更大的生产力协作网络，是信息革命的升级版^[5]。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不断涌现，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正被重塑。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还催生了大量新兴产业，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产业变革正是科技革命成果的具体体现，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因地制宜”的策略尤为重要，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条件存在差异，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适宜的发展路径，才能最大化地发挥科技革命的效能。同时，数字技术的革新加速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深度融合，拓宽了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结合领域。在此过程中，平台作为核心载体，为构建网络化分工与协作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不同地区产业链“结链成网”，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6] (P 22-26)}。

（二）理论逻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理论创新的本质在于对时代性问题的深入探究与有效应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合理性，深深植根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经济逻辑之中。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分工与贸易的内在机制，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只要存在相对优势差异，专业化生产和交换仍能带来互利共赢。这一理论逻辑同样适用于区域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各地区应当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基础、人才结构等比较优势，选择最适宜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而非盲目追求全面发展或简单模仿先进地区模式。马克思关于“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差异化发展必然性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个

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7] (P147) 不同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基础、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特征。这种差异化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必然表现，是实现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有重点地培育新兴产业形态、创新发展模式和培育增长动能，这一实践路径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

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分工协作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揭示了社会化生产分工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内在机制，为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期存在，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能力和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客观上促成了社会化生产分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拓展了分工理论的区域内涵。马克思主要从产业内部和社会层面分析分工问题，新质生产力的因地制宜发展将分工理论延伸到区域空间维度，形成了基于地理空间的专业化分工格局。根据资源禀赋、技术基础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各地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承担不同功能定位，构建起跨区域的协作网络。其二，深化了分工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传统分工理论侧重于效率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化发展揭示了分工在促进创新扩散、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因地制宜的专业化发展，不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推动了技术知识的流动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三，丰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形式。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社会化大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厂制度，而是通过数字化网络 and 平台经济形成新的组织方式。各地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专业化合作，体现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其四，创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互补互促的发展格局，实现了马克思分工理论在区域发展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

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空间维度上的创新发展。新经济地理理论揭示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规律，强调地理位置、运输成本、规模经济等因素对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影响，为我们理解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向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突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效应的重要作用。这一创新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时空维度特征，实现特定时空背景下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平衡，既要追溯同一地域生产力演进的历史轨迹与阶段性特征，又要关注跨地域生产力发展的梯度差序格局。这种动态演化过程要求从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双重维度发力：一方面依托经济体制与科技创新体系改革，形成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开拓国际合作新格局。具体实践中需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精准施策，重点围绕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现代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三）实践逻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8]。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于其支持生产力持续提升的能力，与之适配的制度调整天然具备历史合理性与发展必要性。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往往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成本结构的优化以及资源利用效能的空前增强。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重塑，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科技、量子科技前沿以及新能源技术的全面渗透与融合，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关键驱动力。

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行探索者，浙江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走上了符合本省特色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1060亿元，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6%，首次超过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三年位列全国前列。浙江省通过优化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布局，在创新驱动方面实施“双

尖双领计划”，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依托数智化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在对外开放方面结合地理区位优势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在产业布局方面实施“415X”工程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效率驱动，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面进阶和协同高效运作。浙江省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优化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布局是确保资源高效整合与配置的关键策略。各地区应当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特点和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地制定要素配置策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特色化的要素集聚模式，避免盲目跟风和重复建设。通过精细化调配跨产业的要素资源，依托科技、人力与资本等多要素协同配置，能够有效驱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升级，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新质生产力依托数智化技术，实现了对传统生产要素的全面进阶，显著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促进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同高效运作，催生了新的增长动能与经济空间，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协调互补、错位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构建高效、共享、多元协同的崭新发展生态体系，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整体效率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意蕴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要素革新的重要原则，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深刻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意蕴，是科学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前提。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范式的守正创新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顺应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马克思深刻洞察到，生产力本质上代表了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实际能力。他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9] (P1000)}，强调了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他强调，“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这一过程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0] (P743)}。“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1] (P777)}的思想观点，为之后科技革命时代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质生产力作为全新质态的生产力，不局限于传统生产力‘量’的积累，而是通过‘质’的突破实现范式革命，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跃迁。”^[12]相较于既有的传统生产力模式，它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革新”，还涵盖了应用领域的“拓展”以及区域发展的“适应性”。而“质”则是与单纯的“量”的增长相区分，它依托于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为生产力变革注入了强大的驱动力。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模式是“整合”“引领”与“培育”，而因地制宜则是实现这一驱动模式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传统思维模式往往将科技简单地等同于高端的机器设备，视其为独立于生产流程之外的辅助工具，且忽视了不同地区在发展科技生产力时的差异化需求。在此框架内，科技不再游离于生产体系之外，而是深度融合于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形成差异化的融合路径，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13]。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范式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了创造性跃升，彰显出与时俱进的强大理论活力与实践价值。其守正创新特质可以具体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创新发展生产力系统要素理论的空间维度。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由“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0] (P208)}所构成，并包含科学、管理、协作等非实体要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在继承要素构成的基础上，把地域要素、区位要素和环境要素纳入生产力系统，将创新确立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通过构建多维度要素联动机制和地域差异化配置机制，动态优化资源配置比例，实现生产力要素在空间上的最优组合，提升系统运

转效率，推动生产力实现跃迁式发展。二是丰富生产力演进发展理论的区域化内涵。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社会形态，是社会发展的根源性动力，指出生产力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揭示了生产力在不同地域空间也呈现不同特征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14]，在因地制宜的框架下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总体跃升”不仅体现质的飞跃，还意味着各地区生产力发展空间、层次、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和协调发展，这一跃升强调通过因地制宜的科技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差异化赋能传统产业，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持续性质量提升。三是拓展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方法论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将抽象生产力发展理论与具体地域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既遵循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又体现地域特色的发展方法论。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充分运用

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 (P160)}“生产方式”与“共同活动方式”的统一揭示了生产方式、工业阶段、共同活动方式、社会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统一性表明，任何生产力的重大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与特定社会组织形式、协作方式和发展阶段紧密相连的系统性变革。因而，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跃升，还是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方式的协同变革。马克思用“始终”强调了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又用“一定的”体现了条件性。这种“始终”与“一定”的辩证统一说明生产力发展既遵循普遍规律，其具体实现形式又必然受特定条件的制约。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条件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深刻运用，是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找到科学发展路径的生动实践。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和关键路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8]。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要求是贯彻落实《决定》的前提。鉴于我国不同地域在科技创新潜力、资源禀赋特性及产业基础结构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演进路径自然展现出独特性与多元性。《决定》中倡导的“因地制宜”理念，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如何在既有产业生态中催生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需要规避模式化复制与盲目求全的短视行为，转而聚焦各地域独有的发展条件，实施差异化战略，扬长避短，探索契合本地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从追求单纯经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并重的转型。同时，新质生产力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关键突破口，要求摒弃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把握新技术、新兴产业及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所带来的战略契机，开辟发展新领域，塑造核心竞争力与新兴优势。在此背景下，“因域施策”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精准对接地域特征，持续优化劳动、资本、土地、资源及环境等要素的使用效率，强化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协同效应，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时代引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0] (P698)}科学技术进步是因，劳动生产力发展是果，此二者形成的动态因果链条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力的三重机制。一是直接物化机制。科学原理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工具和工艺流程，直接提升劳动效率。这一转化过程包括工具创新和工艺改进两个层面：科学发现催生新的生产设备，物理学推动机械制造，化学促进材料革新，生物学带来生产工艺突破；同时，科学原理指导生产流程优化，通过自动化、标准化手段提高生产精

度和效率。这种物化不是简单应用，而是科学原理与生产实践的深度融合，每次成功物化都代表人类改造能力的具体跃升。二是知识扩散机制。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使得先进生产方式得以推广。扩散过程具有空间性、时序性和载体多样性特征，技术从创新中心向外围辐射，通过人才流动、技术贸易、产业合作等渠道扩散。这种扩散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与当地条件结合的再创新过程。知识在传播扩散中发生适应性变异，接受方根据自身条件改造技术，这种改造本身就是创新源泉。扩散机制实现了先进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形成生产力发展的放大效应。三是创新驱动机制。这一机制体现在基础研究拓展知识边界、应用研究解决具体问题、试验开发实现技术转化等层面。创新驱动的独特价值在于前瞻性和突破性，既为解决现有技术问题、预见创造未来需求提供了可能，也为渐进改进、开辟全新技术路径创造了机遇。

上述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未来演化路径。新质生产力作为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发展必须遵循这些机制的内在逻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主动把握生产力变革规律，构建面向未来的发展格局。基于产业发展维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立健全未来产业培育的长效机制。通过完善投入保障体系，推动各地区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基于人才发展维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未来指向集中体现为人才红利的充分释放和转化。通过深化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可以有效破解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等环节的体制性障碍，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基于制度创新维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在于构建适应新兴产业特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通过优化科研管理模式、创新组织形式和评价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决策效率不高等现实问题，从而为拓展科技创新的维度、强化研究深度、提升创新效率及增强精准性提供系统性制度支撑。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既强调地方发展的特殊性与自主性，也凸显协调、平衡与灵活的发展理念，为各地区探索实践指明了方向^{[15] (P22-30)}。在具体推进中，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立足地方实际，深入研判区域发展状况，通过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培育现代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等方面，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一）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8]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表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积极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塑造新型生产关系营造更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一是健全区域创新协同机制。一方面，健全区域创新协同体制，完善科技创新生态。这亟须各区域间增进互动与合作，跨越行政与地域界限，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协同高效、运行顺畅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聚焦于创新体制机制的革新，需要深化配套制度体系的改革，增强我国在新科技产业革命中的适应能力、参与深度及引领力度。另一方面，应加速配套制度的改革步伐，以优化新科技产业发展的制度土壤，通过构建跨区域的创新合作枢纽、促进科技成果跨地域的顺畅流动与转化，实现创新资源的广泛共享与高效配置，从而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

二是优化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与吸纳机制。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管理体制与机制的革新发出了迫切需求与转型导向，既有的管理模式与框架已难以契合新质生产力人才独特成长路径与内在发展需求。鉴于此，亟需构建一套与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步调相契合的管理新框架。应着力构建更为开放包容的人才引进生态系统，拓宽国内外人才双向流通的桥梁，促进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新质生产力人才的汇

聚与流动，以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流转，推动全国人才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与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导致现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6] (P38)}。当前，新兴产业面临市场准入壁垒、不正当竞争盛行及政策执行不力等挑战，构成了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桎梏，阻碍了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的顺畅流动，进而减缓了其发展步伐。为破解此困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具体涵盖强化产权保护、优化市场准入机制、促进公平竞争、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等多个维度。同时，需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确立并维护统一的市场规则与竞争制度，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权利与机会，赋予其更多自主决策权。

（二）培育现代化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产业体系，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融合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兴技术，形成具有高附加值、高成长性和强竞争力的领先型产业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17] (P67)}。而“因地制宜”则强调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这不仅能够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能更好地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特色化发展。

一是深化产学研的紧密协作。为了构建深度整合的产学研创新生态系统，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根植于创新驱动的核心战略之中，而这离不开产学研三者间的紧密融合与协作。遵循“因地制宜”的战略导向，应积极催化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深度合作与知识共享，构建起坚实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采取共建科研平台、协同承担攻关项目、资源开放共享等多元化手段，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效率，促进领先产业的优化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以四川为例，该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塑，致力于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实践，通过实施“聚智兴川”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不仅强化了中央驻川高端科研机构、知名学府与本土企业的战略联盟，还加速了创新成果在本土的即时转化与应用。

二是培育领军型企业集群。领军型企业是最有可能通过构建知识“吸收—转化—创造”的闭环系统，将西方技术封锁压力转化为自主创新动能，从而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突破西方科技封锁的主体力量。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应大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军型企业集群。这要求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资助、减税等手段，激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还应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体系。

三是优化产业布局与空间结构。合理的产业布局与空间结构是打造创新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保障。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应根据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密切关注产业和市场的变化趋势，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法规，为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提供科学支撑和保障，强化产业链韧性，优化产业布局 and 空间结构，并通过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等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协同效应。

（三）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源自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中，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孕育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信息、算法和数据为核心要素，通过数字技术与其他生产性要素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18]。这一生产力的核心特质在于其创新驱动力的显著增强，它依托数字化为先导，智能化为内核，为发展进程持续注入强劲动力。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其迅猛发展的态势不仅深刻改造了经济体系的面貌与产业结构的布局，还为经济增长开辟了全新的动力源泉，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

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2]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其覆盖领域持续拓宽，利益调整纵深推进。这一历史性变革进程，为数字经济在新阶段的规模化、高端化、集约化发展注入新动能，构建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性支撑体系。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统筹兼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是强化基础设施构建，促进信息化全面升级。鉴于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作用，各地需依据自身条件，着力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的效能，扩大网络覆盖，提升传输效率。尤其针对偏远区域，应倾斜资源，弥合数字差距，确保发展的普惠性。

二是着力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整合发展。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应聚焦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通过促进制造业向高精尖技术、智能生产体系和低碳模式转型升级，完善制造业投入保障机制。同步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化人工智能技术与新型工业体系有机融合，依托链式协同和标杆示范打造智慧产业集群与数字化园区，孵化具有行业特色的专用大模型和基础性通用平台。着力构建顺应数智技术特性的产业生态系统，针对技术迭代快、应用层次深的特点，创新企业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优化云平台运营机制，构建良性循环的产业发展生态。

三是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其开放共享至关重要。应打破数据孤岛，建立数据流通机制，通过数据交易平台、共享平台等促进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高效利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四是完善监管评估体系，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的监管框架，明确监管责任，加强市场准入、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在推进数字经济治理实践过程中，需要构建科学化评估框架系统，形成周期性成效检验机制，通过动态监测与深度剖析，精准捕捉运行过程中的偏差与不足，主动识别潜在问题并针对性实施解决方案。

五是拓宽国际合作视野，汲取全球智慧。鉴于数字经济的全球性特征，我国应积极融入全球发展潮流，深化国际协同联动机制，通过构建知识共享与创新协作平台，系统整合全球前沿经验与创新技术成果，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实现国际化发展。

四、结 语

新质生产力理论从提出到因地制宜发展理念的确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演进。从出场语境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范式的创新重构，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贯通指引，更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指向的机制演进。从内在逻辑看，它统一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创新，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实践进路看，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培育现代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等举措，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必须深刻认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必然性与理论科学性，立足各地区资源禀赋特征，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发展模式，以此推动生产力理论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实现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深度赋能，加速培育未来产业与前沿科技领域，形成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区域格局。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 旗帜, 2024(3).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0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4] 刘志彪, 凌永辉, 孙瑞东. 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1).
- [5] 高奇琦.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核心特征与应对战略[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2).
- [6] 钞小静.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J]. 人文杂志, 2023(1).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冯继康.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N]. 光明日报, 2025-07-18(06).
- [13] 杜传忠, 疏爽, 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12).
- [14]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 人民日报, 2014-07-30(01).
- [15] 邓子纲.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4).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18] 任保平, 王子月.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The Context of Emergenc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RUAN Yi-fan, WANG Zhi-b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a key focal point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comprehensively. Tailor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this endeavor. The emergence of this approach epitomize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It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production but also represents a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Moreover, it is an essential pathway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ai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local conditions demonstrates both adherence to and innovation within the paradigm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It fully applies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provides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in line with the trends of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At the core of this approach l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vitalit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fostering modern industries, and advancing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孙洁)